

《新文学史》译丛 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 策划 赵培玲 中文主编

New Literary History

新文学史

第 3 辑

[美] 丽塔·费尔斯基 (Rita Felski) 主编
赵培玲等 译

CHINESE TRANSLATION VOLUME 3

人类纪时代的行动主体
Agency at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海外译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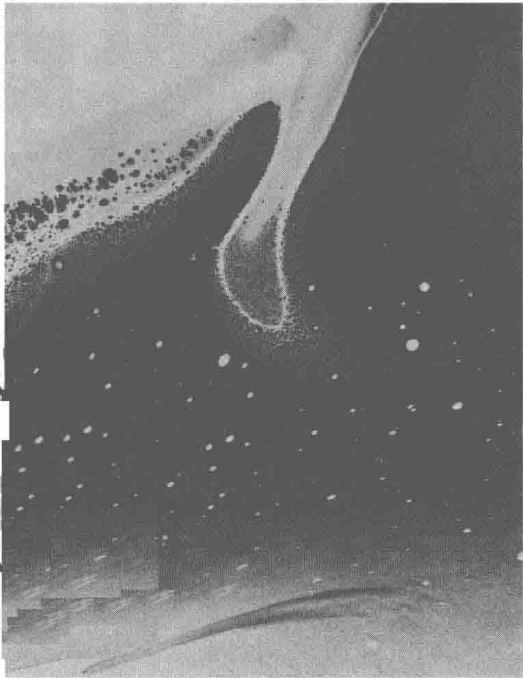
《新文学史》译丛 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 策划 赵培玲 中文主编

[美] 丽塔·费尔斯基 (Rita Felski) 主编
赵培玲等 译

新文学史 第 3 辑

CHINESE TRANSLATION VOLUME 3

New Literary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史.第3辑/(美)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

主编;赵培玲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4

书名原文:New Literary History

ISBN 978-7-308-20063-9

I.①新… II.①丽… ②赵… III.①世界文学—文学史—文集 IV.①I1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36992号

新文学史 第3辑

[美]丽塔·费尔斯基(Rita Felski) 主编 赵培玲等 译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焦巾原

责任校对 赵珏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有艺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8千

版 次 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0063-9

定 价 6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本书由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启真馆出品

序言一

我很荣幸为大家介绍《新文学史》译丛的第3辑。作为国际顶尖人文学术期刊,《新文学史》主要刊发文学理论、文学历史、思想史、阐释学研究文章。自1969年创刊以来,《新文学史》刊载了许多知名理论家如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海登·怀特和理查德·罗蒂等人的创新之作。《新文学史》对中国学界的影响随着部分文章的翻译集结出版而日益扩大。在《新文学史》美国主编丽塔·费尔斯基和国内史学学者陈新教授的共同推动下,《新文学史》译丛的第1辑(2013年出版)选译了1990—2010年间刊发的12篇论文,第2辑(2016年出版)选取了2011—2012年间刊发的12篇论文。译丛的第3辑则从2013—2016年间刊发的论文中选取了12篇。该专辑文章传承前两辑的独创性传统,均具有独特别致的跨学科、多重视角和创新性极高的思想观点,有望打开国内从事文学理论、历史、思想、阐释学研究学者的视野。

《新文学史》里每篇论文都是大家的扛鼎之作,从中挑选文章十分棘手。入选的文章聚焦文学史、文学文化理论、阐释学领域的核心话题,对比、批评或融合了多种文学理论、哲学思潮或阐释流派,提出了反主流、反传统的观点,展示了《新文学史》的学术前沿性和独创性,同时也勾勒出了近5年来文学研究的国际动态和发展趋势。为帮助读者整体把握本专辑,我粗略地将12篇论文分为四个板块:人文学科发展、叙事理论、文学和文化理论、阐释理论。

在人文学科发展篇里,学者们高屋建瓴,探讨了人文学科应该如何重构认知来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面对地球生态危机,布鲁诺·拉图尔在《人类纪时代的行动主体》一文中提醒我们,人类已经错过了和自然签订合约的机会和资格,唯一的出路是保护自己。为此,他呼吁,人类应该摒弃传统的科学世界观,拒绝对自然实体去生命化,避免将自然实体表现为单纯受因果关系支配的客体。这就意味着人文学科要重新认识自然的行动主体身份。针对人文学科被边缘化,甚至行将消失的危机,史蒂文·康纳在《解构人文学科》一文中指出,人文学科应该像拉图尔呼吁的那样,不要再孤注一掷地研究“人类”或纠

结于人文学科的本质是什么，而是要去探索人类所参与的所有活动——工业生产、经济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发展和数学推导。在《世界与地球：探讨建立一个世界文学的规范概念》一文中，谢平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以西方的时间和进展为标准将世界上的每个民族（包括他们的文化和文学）融合成为一个世界体系，剧烈地摧毁了其他世界及其时间。他认为，应将世界重构为时间概念，而不是空间概念，并指出这种认知有一种创造力，可以抗衡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文学研究的悄然转变：1.3万学者能够告诉我们的真相》一文中，安德鲁·戈德斯通和特德·安德伍德呼应了拉图尔和康纳对人文学科的认识论，探讨了文学研究的转变。两位学者借助于他们的主题建模研究案例呼吁人文学者应重新认识量化研究在探索文学历史和发展趋势、文学阐释等方面的作用。

叙事理论一直是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和《新文学史》的重要研究主题。叙事理论板块共有两篇文章，从哲学角度着重探讨了小说叙事的本质和意义。在《叙事与人的存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一文中，汉娜·梅雷托亚指出叙事理论家和小说家在叙事之于人类存在的意义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他们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三个哲学维度上的分歧，但最根本的分歧在于隐含于各叙事理论中的本体论假设。在梳理怀特、萨特、默尔索、巴特、罗伯-格里耶、萨洛特、利科和卡尔等理论家的叙事观和“反叙事”观的基础上，梅雷托亚提出自己的叙事观。首先，生活和叙事不是对立的，即叙事不是强加于生活或经验之上的，生活不是抵制叙事顺序的；相反它们是彼此交织着和互惠并进的，对经验的叙事阐释不仅没有扭曲经验，反而建构了我们的存在本身。其次，叙事能够构建我们的存在是因为叙事参与创造主体间性的世界，影响着我们与他人交互的方式。最后，叙事不等同于经验或事件，叙事的本质是阐释，所有叙事都是可以被质疑的，都是可以被重新叙述的。阿德里安娜·卡瓦雷罗在《对抗毁灭的叙事》一文中借助于传记叙事阐述了叙事如何具体地构成了人的存在，和梅雷托亚的叙事观形成了呼应。通过比较荷马的奥德修斯传记叙事和西博尔德关于大屠杀的传记文学，卡瓦雷罗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传记都仅仅是通过支离破碎的细节来重构一个连续的生命线索，大屠杀传记叙事通过生命故事使被摧残的人类免于毁灭，赋予这些生命以存在。因而，卡瓦雷罗认为，从本质上讲，这种叙事是对“那种已经吞噬了生命本身的毁灭之

举的抗拒。叙事最终是一种对抗毁灭的塑造，一种对抗摧毁的创造，一场对抗消灭的行动”。

文学和文化理论板块中的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或理论进行了整合和重构。温弗里德·弗拉克的文章《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哲学前提：自我异化的叙事》深度分析了许多文学文化理论背后的自我异化叙事，并探讨了自我异化叙事对文学文化研究的各种挑战和启发。首先，在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狄奥多·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福柯理论的基础上，弗拉克指出，自我异化是由工具理性在人类文化、精神生活和主体性中的入侵所导致的主体扭曲引起的，因此，文学和文化研究要反对工具理性，重塑具有创造力和反抗性的主体。其次，弗拉克指出，雷蒙德·威廉斯的自我异化叙事论视工业化为一面双刃剑：它导致了现代社会自我异化，但它同时也为社会合作提供了机会。因此，弗拉克提醒我们，为了防止文化复制工业化分工的方式，文学研究要扩展到文化研究，并把文学当作是整个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然而，弗拉克从沃尔夫冈·伊泽尔的接受理论立场出发指出，自我异化不仅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也能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那么文学具有将自我异化转化为创造力的潜力，因此，文学和文化研究应侧重于刺激读者参与的文本。弗拉克探讨了拉康和朱迪斯·巴特勒等人的后结构主义思想中的自我异化叙事的自我矛盾性，并强调了自我异化能够促使人们重新赋予意义的可能性。同时，弗拉克指出，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主体间性思想可以使主体间性自我叙事代替自我异化叙事。弗拉克最后强调，归根结底，寻求认同是动力，而寻求认同最重要的文化领域之一是“虚构的文本、审美对象，以及不断提供双倍新经验和主体身份选择权的文化实践”。

乔治娜·博恩在《制造时间：时间性、历史和文化客体》一文中，指出时间人类学的两大思潮——多重时间性理论和新过程理论，均没有认识到在人类和非人类生活以及文化生产中运作的多重时间性，并尝试构建关于文化生产的另类时间观，从而为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时间概念。博恩阐述了她的时间观：(1) 艺术或文化客体既是时间媒介，同时又具有产生时间和空间的能力，时代、艺术家、批评家或观众与艺术文化产品之间并不存在统一性；(2) 音乐通过对其内在时间性的偶然表达来产生时间，而反过来在社会、文化、政治和

技术变革中内在的各种时间性又会指导音乐和音乐流派的演变，同时音乐的时间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艺术形式的时间理论化；(3) 通过对当代数字音乐进行民族志和历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为时间和历史理论的重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而目前流行的数字音乐凸显并强化了这些潜能。通过政治理论来探讨小说（文学）对民主思想和实践的贡献是桑德拉·M. 古斯塔夫森在《作为个别性的平等：反思文学与民主》一文的主要目的。在引用罗桑瓦隆的平等作为个别性的民主思想和艾伦的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古斯塔夫森构建了民主批评的理论框架，用来阐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文本中的民主思想和实践。在此框架下，古斯塔夫森考察了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和厄普顿·辛克莱的作品中对民主实践和民主理想的探索，并强调指出，文学从根本上推动了民主思想的展开，一些看似反民主的作家实际上也促进了民主的展开。陶丽·莫依在《例证思考：日常语言哲学能为女性主义理论做些什么》一文中，提出用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思想来引导女性主义理论在观念上的转变。莫依以交叉性理论为例指出了女性身份理论的局限性：它们企图构建一个囊括所有可能身份的复杂体系，这样往往使女性主义理论变得过于抽象，束缚了我们对女性具体处境和经验的探索。莫依指出，例证思考可以让女性主义者避免这种普遍性渴望，避免试图对“交叉性”或“身份”进行理论化，从而引导他们对于一个具体问题、具体案例和实际经验进行维特根斯坦式描述。

阐释理论是《新文学史》的另一特色主题。阐释理论就是假设人们通过把意义赋予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来积极地解释他们的经验的一种理论视角。本专辑阐释理论篇则颠覆了一些普遍被接受的阐释理论。我们通常认可文学知识能够给文本阐释者自由、革命思想和个性释放的观点，但詹姆斯·辛普森在《认知就是识别：文学知识和文本的“脸孔”》一文中颠覆了这一观点。辛普森指出，我们的阅读活动恰恰相反：它“总是依赖某些内在准则，并要求我们假设某一个既定体裁中的每部作品都是‘一样的’”。据此，辛普森认为，文学认知的本质并不是激进的，而是一种识别或再认知，阐释活动的快乐在于享受识别文本“脸孔”带来的快乐。阐释理论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解读的框架，但是大多数阐释理论都过于倚重文本这个理解场和无限地追求解读意义的持续性、连贯性与完整性。因而，达维德·帕纳吉亚在《多面论：媒介参与

和政治理论》一文中借助多面论批判了阐释理论的这种局限性，并提出了一种不以统一的认知观作为政治思维共识的政治理论化模式。帕纳吉亚认为，政治理论活动不应仅局限于文本媒介，应更多关注“机械物质性”，包括各种代理材料，如各种技术对象和存储容器（如档案柜、剪报、投影机等等），更多地探讨它们如何参与了对各个方面的提炼、编排与呈现等。从多面论角度出发，帕纳吉亚指出，政治理论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调解人、对象和术语之间的关系的过程，因而政治理论研究是对各个方面如何在缺乏生存标准的情况下实现共存的研究，实际上参与了人、地方与事物的解释过程。

综合来看，这些板块虽相对独立，但又相辅相成，其研究视角和方法有诸多共同之处。现略举一二。第一，历史性。无论是讨论人文学科的发展，还是构建文化理论，这些研究均能够追溯某一现象、概念或理论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轨迹，具有很强的历史感。例如，拉图尔为了探讨自然实体的主体性而梳理了整个科学发展史；卡瓦雷罗的传记叙事讨论横跨了荷马时代、现代和当代；博恩梳理了时间人类学的发展史；安德鲁·戈德斯通和特德·安德伍德借助于语料库分析了文学研究在过去 120 年的发展历史模式。第二，理论杂糅性。文学研究离不开运用理论，但这些学者对于理论的态度是，既不拘泥于单一理论，也不采取非抑即扬的极端对立方式；他们往往杂糅诸家理论，在对比、批判、综合中借用、构建和创新。例如，弗拉克对自我异化叙事的研究融合了 15 位以上的理论名家的观点；梅雷托亚探讨了 10 位以上理论家的叙事观和反叙事观；帕纳吉亚对多面论的探索涉及了休谟、阿莱塔·诺弗尔、维特根斯坦、查尔斯·泰勒、昆廷·斯金纳及詹姆斯·塔利等人的思想和理论；谢平对世界文学的定义探讨包括了奥尔巴赫、戴维·达姆罗施、约翰·皮泽、卡萨诺瓦等人的思想；莫依把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哲学理论和交叉理论有机地糅合在一起。第三，文本性。虽然帕纳吉亚反对文本中心论，但文学和文化研究通常情况下是离不开文本的。拉图尔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约翰·迈克菲《掌控自然》中的细节解读就为读者理解对自然实体“去人格化”这种做法的极大危害性提供了具体的例证。辛普森研究的文本包括小说、诗歌、对话等等。古斯塔夫森聚焦于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和厄普顿·辛克莱的作品。卡瓦雷罗比较了《奥德赛》和《移居者》等文本。

本专辑的每篇文章都值得我们去反复研读。上面的板块介绍和共性分析远远不足以呈现这些学者深邃的思想和新颖的观点。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文学史、文学文化理论和阐释理论领域研究的高屋建瓴的视角、杂糅百家的方法、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和精密细致的推理。他们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他们对人文学科研究的执着追求以及他们对人类和自然世界的忧患意识都将极大地启发和激励我们的研究。

赵培玲

2018年7月27日于长沙

序言二

从本辑开始,《新文学史》译丛由广州大学文学思想研究中心主办。

任何文学研究都需要经由某种思想才能抵达所在。一切文学对象的研究都是研究者思想切入的结果,也就是具有怎样的思想就将具有怎样的研究结果。如果说机械化时代意味着体力劳动解放的话,那么,数字化时代则意味着脑力劳动的解放,意味着从“搬运工”式的资料收集研究,转向更深层次的思想性与理论性的研究。

事实上,文学研究从未拒绝过思想。即使是文献考据,也隐含着一种实证主义的思想。它预设了先在的文献事实,一种艾尔曼所指出的“经验主义的立场”,它强调有效的知识必须为外部事实和不偏不倚的观察所确证。不过,文学的文献学研究很少反过身来对这一研究的出发点进行认识论的反思,而往往不自觉地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而转向一种纯技术的路向。例如常见的“史料批判”,包括史料的发掘、搜集、清理、辨析、甄别、评价、保存等具体研究。这就将文本置于工具理性的观照下,于是,文学研究往往呈现出工具性的结果。但如果我们对文献或文本进行本体论的追问,进行康德意义上的“批判”,我们将获得更为广阔、更为深入的研究视野,正如我们从克罗齐、英伽登、伊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那里所获得的新维度一样。

但是,中国的文学研究并不仅仅是上述理论的应用与证明。中国的文学研究具有自身的文学对象,应该生产出与之相应的理论。正是在这里,我们面临着继承传统、引进新论、创新理论这一多元维度交织的情境。恪守旧路者往往引述一种观点为自己辩护,这种观点认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继承传统就是对世界文学研究的创新,睥睨一切外来的新理论与新方法。但这种引述未能在理论的根基处进行把握,因而是一种理论的断章取义。显然,民族的之所以是世界的,乃是因为需要首先奠基于世界这一普遍性才具有可能。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阐释的历史观,将中国历史置于一种外部背景的关系中进行断代的质性划分:中国之中国阶段、亚洲之中国阶段、世界之中国阶段。在这种历史观中,

中国历史之所以有可能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乃是因为其处于“世界之中国阶段”。而在“中国之中国阶段”，不知“世界”为何物，民族的就只能是民族的。

文学研究同样如此。如果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不置于世界的文学研究这一背景中进行观照，就不可能获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普遍意义。因此，与中国历史进入“世界之中国阶段”相匹配，中国的文学研究也需要进入“世界之中国文学研究”的阶段。《新文学史》作为国际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研究读物，正是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世界性”这一时代背景，从而使中国的传统文学研究获得世界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背景不仅使我们的研究在“世界性”中成为在场，而且正如鲁滨孙一样，使得自我的认识成为可能。

《新文学史》第3辑所收入的2013—2016年间发表的12篇文章，代表着当下世界文学研究的不同视野，而不同视野的交织就构成了一种“世界的”图景。本辑收入的法国著名哲学家拉图尔的《人类纪时代的行动主体》一文中提出了“人类纪”这个概念，对以往的“世界”提出了新的看法。“人类纪”时代的“世界”不再是传统表达的被动的自然世界，而是已经是一个具有行动主体的一切特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就不再是主客二分中作为“主体”的一方，而是“与其他同样失去了自主性的主体们共享主体能动性”。于是，“世界”进入了一个“人类纪”的时代。中国文学当然也需要置于这一背景下来进行认识。

但是，中国文学及其研究同样不是被动地由背景决定的。它和研究者一样作为行动的主体，一道参与了“人类纪”时代的互构。互构是一种多元行动者网络的交织。正是互构，中国文学不仅可以获得外部理论的观照，而且本身也参与并织造了整体网络。当下，我们所遇到的最大挑战，乃是面对中国丰富的古今文学实践，却十分缺乏一种自身的理论观照。布莱希特能在中国的文学资源中提取出一种理论形态，就表明中国文学具有丰富的理论养料。只有不拒绝并反省外来思想，才能完成中国文学理论的自我反思与建构。

为此，我们期待更多的《新文学史》新辑的出版，更期待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也进入《新文学史》中，在引进与互构中携手共建理论世界的行动者网络。

刘晓明

2018年8月

新文学史 第3辑

目 录

1. 人类纪时代的行动主体	布鲁诺·拉图尔	1
2. 解构人文学科	史蒂文·康纳	19
3. 世界与地球：探讨建立一个世界文学的规范概念	谢平	33
4. 文学研究的悄然转变：1.3万学者能够告诉我们的真相	安德鲁·戈德斯通 特德·安德伍德	59
5. 叙事与人的存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	汉娜·梅雷托亚	87
6. 对抗毁灭的叙事	阿德里安娜·卡瓦雷罗	108
7. 文学与文化理论的哲学前提：自我异化的叙事	温弗里德·弗拉克	125
8. 制造时间：时间性、历史和文化客体	乔治娜·博恩	148
9. 作为个别性的平等：反思文学与民主	桑德拉·M. 古斯塔夫森	174
10. 例证思考：日常语言哲学能为女性主义理论做些什么	陶丽·莫依	196
11. 认知就是识别：文学知识和文本的“脸孔”	詹姆斯·辛普森	222
12. 多面论：媒介参与和政治理论	达维德·帕纳吉亚	242

人类纪时代的行动主体^{*}

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著

赵培玲 译

“至5月3日星期五为止，莫纳罗亚火山口 (Mauna Loa) 的二氧化碳浓度已达到 399.29 ppm”，当一个人读到 2013 年 5 月 7 日星期二的《世界报》(*Le Monde*) 上的这样一句话时，他该作何反应？同时，他该如何理解这篇文章标新立异的题目——《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处于 2500 万年来的最高点，这一温室效应气体含量的主要指标即将在今年突破 400 ppm》？该信息让人惊讶于地球的悠久历史之余，也让人感到采取集体行动的紧迫性。该新闻的副标题则以平静的语气述说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二氧化碳含量早在 1990 年前夕就已经超过了安全阈值。”因此，我们不仅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文明近期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某种比人类本身更古老的自然状态（文中的图表说明了即使是最古老的人类工具在地质历史中也是最近才出现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充满一种忧患意识：剧本已经完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已经发生——科学家们所设下的九条绝不可逾越的“地球法则”中已有多条被打破。^[1] 不难看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无论精神上还是情感上都难以应对这一宏观尺度上发生的事件：一方面他们难以把控不断加速的环境恶化过程并意识到了自己负有的责任；另一方面这种新的对于环保行动的呼吁似乎并不具备他们老一代革命梦想的特征。我们作为地球漫长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为何到现在才意识到已造成的破坏？为何我们修复自然的努力仍然收效甚微？

^{*} Bruno Latour, “Agency at the Time of the Anthropocene,” *New Literary History* 45, no. 1 (2014): 1–18.

这篇报道有两方面让我感兴趣：首先，它提出的数据来自多个学科门类的研究成果——从气候学到古生物学；其次，它构建了一个将这些学科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历史叙事。我们无法将该报道视为一个旁观者通过冷漠观察所得出的“客观事实”，像我们之前对待“自然科学”发现那样。在地球环境问题上没有人是彻底的旁观者，也无所谓纯粹的客观，至少旧的客观性概念已无法用于把握历史中的行动主体。难怪对地球变暖问题持怀疑态度的人完全否定这些数据的可靠性，认为它们不过是吓人的把戏。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然而并非因为这些学科无法提出能经得起反驳的客观结论，而是因为当我们探讨与人类相关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时，客观性概念本身就被完全颠覆了。^[2]

科学研究的一个老问题是如何理解科学家在知识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现在，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出来：我们如何理解人类在事实的构建过程中以及在这些事实所记录的现象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知识、新闻、故事、提醒、警告、规则以及责任这些概念的细微差别完全被混淆了。正因如此，我们才迫切需要重新界定其中的一些概念。考虑到经济学和生态学都与“科学世界观”有密切关系，我们在分析应当如何从经济学转向生态学时，尤其需要界定概念。

在20世纪90年代初，正当二氧化碳含量浓度悄无声息地超过安全阈值时，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在一本大胆且极具个人风格的著作《自然契约论》（*The Natural Contract*）中，不仅提出了许多创新观念，还在虚构情境中再现了伽利略的名言：“但地球还是在动。”根据我们所接受的高度精简的科学史教育，在宗教裁判所禁止伽利略宣扬地球运动的学说时，他呢喃道：“但地球还是在动。”塞尔将这个小故事称为“第一场审判”：一个预言家式的科学家在对抗当时的权威时，轻声说出了日后终将摧毁这些权威的真相。而现在，塞尔为我们描绘了“第二场审判”：在那些拒绝关注地球变化的权威面前，一群具有同样预言色彩的科学家不得不保持沉默，并默念出更惊世骇俗的真相：“但地球还是被撼动了。”（法语原文中这一点体现得更清楚，试比较“*Et pourtant la Terre se meut*”和“*Et pourtant la Terre s'émeut*”。）塞尔写道：

三个世纪前，科学向地球寻求帮助，而地球通过运动来表示支持，

于是，科学家们独占鳌头，伽利略这个预言家被加冕为王。现在轮到我们了。当我们像伽利略那样大声疾呼“地球被撼动了”时，我们诉诸的却是无法在场的权威；在满是伽利略的后继者的法庭上，古代的预言家们被封为王者。那个亘古不变的、作为我们一切生命前提条件的地球正在战栗中缓缓挪动。^[3]

在学术研究的语境下，我无须说明地球在原本星体运动之外还受到这些全新的情绪的困扰。地球不仅围绕太阳公转（这一点已经是常识），还要受到其承载的生态系统的复杂运动的影响。对该影响的研究被称作“地球系统科学”，或者被称作一个更激进的名字，“盖亚”（Gaia）。^[4] 盖亚是一位棘手的女神。在哥白尼革命发生四个世纪后，地质学知识突然有了全新的意义，以至于上文所提到的查尔斯·戴维·基林（Charles David Keeling）在莫纳罗亚火山的观测数据没有刊载在该报纸的“科学技术版”，而出现在新设立的一个专门报道“地球生态悲剧”的板块中。^[5] 大家已经达成共识：地球不再是一个台球般沉寂的伽利略式天体，而已经具有了一个行动主体的一切特征。的确，正像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提出的那样，地球又重新成为一个历史中的行动者，在别处我已提议将该历史称为我们共有的地质历史。^[6] 对于研究哲学、科学或者文学的我们而言，问题在于应该如何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不该对这一点感到奇怪，“地球被撼动了”这句话给现代权威带来的惊诧度丝毫不亚于“地球在移动”这句话带给中世纪的。正如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者惊讶地听说地球竟然只是一个在浩瀚宇宙中不停旋转的桌球一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剧作《伽利略传》中梵蒂冈的僧侣和主教们在地板上以漫无目的的旋转来讥讽伽利略的日心说〕^[7]，新的审讯者们（现在他们为经济而非宗教代言）惊讶地发现地球已经成为，或再次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此在的、有限的、敏感的、脆弱的、颤抖的、易受扰动的壳体。我们需要另一个布莱希特来描绘这样的情形：相当数量的人〔如科赫兄弟（the Koch brothers）、某些物理学家、许多知识分子、一大群左派或者右派的政治家，以及相当多的主教和牧师〕在脱口秀和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上质疑对于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敏感星球的重新认识，这种质疑是如此之激烈以至于他们不惜否定整个自然

科学的有效性。

为了说明地球不过宇宙中众多天体中的平凡一员，伽利略必须把气候、生物扰动和环境变化等因素（除了潮汐）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而为了第二次重新认识地球，气候学家重新引入了气候的因素，更充分地考虑月球引力的影响、遭受的污染以及生物扰动。伽利略眼中的地球可以旋转，但它没有“临界点”^[8]，也没有“地球法则”。就像迈克尔·休姆（Michael Hulme）所说，这两个概念恰恰标志着一种新的话语模式：去谈论“气候”而非“天气”。^[9]在前科学时代居民眼中，地球是一个充满腐败、死亡和堕落的污水坑，他们凝视着天空中不朽的太阳、群星和上帝，将仅有的一点超脱的希望寄托在祈祷、冥想和知识上；今天，我们经历着一场反哥白尼革命，科学发现迫使我们意识到地球仍然是一个充满动乱、衰败、战争、污染、腐败的污水坑。然而这一次祈祷不再有效，我们也无处可逃。曾经我们把视野从一个封闭的寰宇（cosmos）转向无穷的宇宙（universe），^[10]现在我们需要把目光重新投向寰宇，但这里没有秩序和上帝，没有等级和权威，故已不再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寰宇——该词本意指美观的、精巧的排列。不妨以希腊语中“全宇”（kakosmos）一词为地球的新状态命名。从寰宇到宇宙再到全宇的变化中，我们经历了多么奇怪的戏剧性变化啊！这种体验恐怕比布莱希特剧作中可怜的萨尔蒂夫人（Mrs. Sarti）的经历更让人坐立不安。

虽然我们仍需与那些否认地球生态危机的人进行论战，但我建议先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于“寰宇政治学”（cosmopolitics）的讨论。^[11]我想在本文中探讨的问题是：这个新的地球观念应当具有什么样的主体能动性？塞尔的另外两个观点有助于更加清楚地阐释我的目的。就在上文引用的段落之前，他将主体与客体的意义颠倒，并试图在法律意义上理解这一对概念（《自然契约论》首先是一部法哲学著作）。

今天，地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不是因为它永不停歇地做圆周运动，也不是因为它从表层大气到深层地壳都在经历着各种变化，而是因为它正为人类活动所改造。自然之所以能充当古代法律和现代科学的参照对象是因为它没有主体性，在法律上处于客体的位置。